

与新闻相连的人生

自参加工作至今48年来,虽说以新闻为“主业”的时间不满3年,但其间总是断断续续地写点小稿。48年中,我有45年与新闻工作沾边,与新闻打交道的的时间从来没有间断过。

1976年12月,我入伍当年年底,被抽调到团政治机关学习新闻写作。当时部队的新闻干事、被称为“土记者”的张福荣,手把手地教我怎样发现有

价值的新闻线索,怎样进行采访,怎样整理新闻素材;从小故事、短消息起步,学写新闻;带领我去报社、电台见编辑、记者,帮助我将习作变成铅字。从那时起,我便将自己的人生与新闻写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1978年初,部队清理机关借调的战士,按规定,我要回到连队去。但此时我的军事技术已经有些荒废了。我想,与其回连

队,还不如退伍回老家。得知我的想法后,张干事领我去见团首长,特许将我作为新闻干部的“后备人才”储备起来。于是,我被安排到营部担任书记,这是相当于文书的排职干部。

转业到地方工作后,我仍然坚持写新闻,并尝试写点小言论。许多报社的编辑、记者,为了帮助我进步,不厌其烦地为我出点子、指路子、改稿子。

当我的稿件发表后,他们还及时向我反馈读者的意见和建议。就这样,我坚持写作,乐此不疲,还偶尔在家乡的报纸上发表文章。其实,我心里清楚,每一篇稿件的发表,都凝结着编辑、记者的心血和汗水,他们充当着无名英雄的角色。

结缘新闻,是我的幸运;结缘记者,不断带给我好消息。

艾立起/文

朝花夕拾

当上“编外记者”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在北京求学。一次,我和同学去八达岭长城游玩,途中发现,一款供不应求的某品牌啤酒乱涨价。那时实行计划经济,很多商品都是凭票供应,明码标价。于是,我们立即跟店主理论。谁知,店主非但不讲理,还说让我们“告去”。同学们听了很生气,立即叫我把这一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反映到报社。由于我平时喜欢听新闻广播,也爱看报纸新闻,喜欢写作,在同学们的鼓励下,我将这一情况写成稿件投到相关报社。没过几天,《北京日报》《中国消费者报》《北京物价报》就刊登了,且反响较大,物价部门立即进行了整治。北京物价报社的一名记者还找到我,带我进行了跟踪采访。跟踪采访采写的稿件在《北京物价报》一版刊登后,文中把我署名为“本报特约记者”,该报记者还说,以后我可以多写这方面的稿子。

我在北京求学的那几年,先后在《北京物价报》刊发了《物价局暗查“信得过”》《北京站七十多家餐馆明码标价》等20多篇新闻稿,都是署名“特约记者”。直到我毕业去外地工作,人生第一次当“编外记者”的经历,才算告一段落。

汪志/文

图说往事



夫妻合影

参加乡村教育工作的第二年,通过同事介绍,我与在供销部门工作的一位女子建立了恋爱关系。1989年元旦,我俩乘长途客车,从山东平度出发,赴烟台祖父的居住地举行了婚礼。3月,我与妻子到平度市店子镇一家有名的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。照片中我穿的那件涤毛呢,是妻子用她自己的工资特意为我买的。许培良/文并供图

追忆父亲

父亲离开我们20年了,他的一生很平凡,有过短暂的军旅生涯,也蒙受过冤屈,好在后来冤屈得以平反。

父亲是唐山迁安人,1947年11月入伍,参军的队伍是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冀热辽支队,在炮兵团当文化干事,负责写标语、教战士唱歌等工作。

1948年6月,父亲随部队去执行任务时被敌军打散,他和4名战友被追赶到迁安五重安乡石门村,村里的一位妇女收留了他们。当时的形势很危险,土匪领着国民党部队包围了全村,并在西山顶上架起了机关枪,随后挨家挨户搜捕。那位妇女给父亲他们做了饭,嘱咐说她去村里看看情况,她不回来就不要动。过了好长时间,也不见那位妇女回来,父亲他们觉得情况不好,

决定迅速撤离,骑马向村东飞奔。十几个土匪发现他们后,高喊着“抓人”,西山头上的国民党士兵迅即开枪扫射,父亲和另一名战友中枪落马,摔倒在小河沟里,河水都被染红了。3个国民党士兵赶过来,准备用刺刀挑死他俩。一个土匪阻止说:“反正他俩也活不成了,就让他们多遭会儿罪吧。”土匪和国民党士兵走远后,村里的群众立即把父亲和战友抬到家中救治。父亲的战友伤势过重,喝了一口水就牺牲了,父亲命大,总算活了下来。村里的群众告诉父亲,帮助他们的那位妇女被土匪杀害了,其余3名战友,两名牺牲了,另一名跑了出去。父亲听了这一消息,悲伤了好些日子。之后,父亲一直在群众家中养伤,半年后被转送到部队野战

医院治疗。由于是贯通枪伤,造成腿部粉碎性骨折,父亲的右腿比左腿短了一寸半,要拄拐走路,不能盘腿坐,不能蹲,丧失了劳动能力。1949年,父亲被评定为革命伤残军人(二等甲级),退伍回家。

身体的伤残对父亲的打击很大。然而,更大的打击是,1954年,我家被划为富农。父亲拖着残腿,不断地为家庭成分问题奔走反映,终于盼来了好结果。1980年10月9日,迁安县革委会签发批复信,决定恢复我家中农的成分。从此,我家的生活才变了样。我们兄弟姐妹8人先后长大成人,各自成家立业。

吴占权/文

(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所有来稿请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)

农科队忆旧

1976年年底,我插队的生产大队从下属的10个生产队每队抽了1亩地,又让每个队出一到两个人,组建了一个13人的农科队,要在农业科学研究方面搞出名堂来。

在这13人中,年纪最大的是老王,已经80岁出头了,原来是大队的放水员。年龄排在第二的,是一位冒姓老爹,70岁开外。年纪排第三的则是农科队的队长,姓吉,年过半百,早些年是做纸扎匠的。与吉队长年龄相仿的还有另一位半百之人,也姓冒,个子大约1米6,矮矮壮壮的。此外,与我年龄相近的,20岁上下的大姑娘、小伙子有6位。30岁到40岁的,除去农科队的陈会计之外,都是妇女。提起这样的年龄与性别结构,队长老吉直摇头。也难怪,那年头种田靠的是力气,这班人能行吗?

既然是搞农业科学研究,文化知识是少不了的。在这个农科队里,我是唯一的高中生。但是,从小学到高中的10年,恰恰是“文革”10年,我学到的知识非常有限。此外还有一位小伙子是初中毕业,其他人要么是小学文化,要么是文盲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成了农科队当仁不让的农技员。可我就是个插队知青,才插队不到半年,别说农业科学,就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,诸如小麦、水稻、棉花该什么时候播种、什么时候收获等等,都一无所知。实话实说,我在农科队干了一年多,从队长老吉到陈会计,乃至普通队员,没哪个把我这个农技员当回事。在

这一年里,农科队到底搞成了什么科学研究,我只能说它徒有虚名,也就是跟其他生产队一样,春种秋收而已。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,也就是在农科队,我们多喝了几碗粥:农忙的时候,队长老吉让人做上一大锅玉米粥或者大麦粥,干完活儿喝粥,喝完粥干活儿。

因为农科队尚不具备结算能力,所有成员所挣的“工分”要划到原来所属的生产队结算。结果,我一年下来所挣的工分,居然还不够抵生产队分给我的口粮,还倒欠生产队一笔钱。这让我十分不解:这一年我在农科队几乎没歇过一天,怎么居然连自己都无法养活?因为我身无分文,欠生产队的口粮钱我没给,会计也没追究。

到农科队的第二年,我有些灰心丧气,加之听说要恢复高考制度了,我悄悄地加入到复习应考的大军,没好好在农科队干。不过,即便是好好干,我认为在农科队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。

40多年过去了,上世纪70年代一哄而上的大队农科队已成为历史。可以说,我是那场运动式的农业科研的亲历者、见证者。

严阳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